

国际政治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问题刍议*

赵明昊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以安全为导向,但面临被“安全化”的突出难题,客观上也存在诸多安全风险挑战。发展通常是解决不安全根源的一种手段,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诱发和深化各类安全问题的因素。“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较为显著的“安全赤字”,安全保障工作涉及面广、不可预测性强,应对难度大。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落地,不仅需要探索深化对外经济合作的创新性思路 and 做法,也需筹谋如何有效应对安全保障问题。“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其核心挑战在于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处理好“发展—安全相互联结”的难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安全保障;非传统安全;安全化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6)02-0001-06

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正式进入从愿景到行动的 implementation 阶段,如何确保这一宏大深远的国际合作倡议得到稳步推进落实,是我国亟待筹谋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是以发展为基本导向的国际合作倡议,但正面临被“安全化”的难题,而且客观上也存在诸多安全风险挑战。为推动“一带一路”顺利落地,不仅需要探索深化对外经济合作的创新性思路 and 做法,也需努力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做好这一工作,也有助于进一步落实“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等重大政策理念,促进我国外交和国家安全事业的积极转型。^[1]

一、“一带一路”建设:被“安全化”问题较为突出

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件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

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由此,“一带一路”建设基本着眼点是扩展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具有以发展为导向的鲜明特征。

国际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化”或“安全化”是导致这类合作推进不利的重要因素。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教训。美国欲借“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助其稳定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进而促使中亚国家降低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新丝绸之路’计划毫无必要地将典型的贸易政策‘地缘政治化’了,该政策有意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排除在外。”^[2]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也面临妥善处理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的难题。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联盟成员国坚决主张该机制应完全聚焦经济问题,由此与俄方产生一定嫌隙。近年主要由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乌克兰危机”也对“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产生显著负面影响。^[3]

“一带一路”建设需充分吸取美俄等大国推进国际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12&ZD083)的阶段性成果。

经济合作的教训,明确坚持该倡议以发展为导向的属性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注重在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为倡议“脱敏”。与此同时,需高度重视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建设被“安全化”的问题,即安全色彩或安全因素在并非自身本意的情况之下被过度突出。

首先,大国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博弈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担心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外衣”扩展在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安全存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虽然中俄两国政府已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达成初步协议,俄方也期待借此获得中国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但俄战略界仍对中国的“西进”抱持较大疑虑。^[4]印度则对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感到忧心,有印度专家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珍珠链’战略的经济掩盖方式”,中国通过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沿岸地区经营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印度构成战略围堵之势。^[5]

其次,沿线中小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建设会使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从而致其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公路、铁路、港口、油气管线、通讯等诸多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中国在贸易、货币等方面的联通进程中也处于优势地位。客观讲,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普遍落后于中国的沿线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存在一定担忧。很多在中方看来有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项目,在中小国家看来却有可能影响其国家安全利益,它们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普遍较高。对于一些沿线国家来说,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越强,它们往往就会在安全问题上增强对华戒备与防范,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6]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关涉经济利益的调整和分配,或会间接地诱发和强化有关国家内部和跨国性安全问题。2015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集全巴政党会议,专门讨论“中巴经济走廊”问题,旨在协调不同族群、教派团体、地方强人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地域,瓜达尔港区位于该国俾路支省西南部,长期受到俾路支分裂主义武装力量的袭扰,巴政府对该地区实际控制力有限,相关经济建设难免受到当地复杂政治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影响。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运输通道的同质竞争等问题也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除受到国内利益冲突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大量跨

国性安全因素的掣肘。比如,缅甸“罗兴亚人”问题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带来负面影响。中亚国家围绕水资源、边界划分等产生的长期冲突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造成冲击。^[7]

第四,随着各类项目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责任划分与成本分担等问题将会越发突出。“安全”在本质上是有属性的,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过去十余年,美国在阿富汗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阿富汗人却认为这只是在满足美国人自身安全需求,抱怨美方不尊重阿富汗政府在安全事务上的主权。^[8]由此引发美国在阿行动究竟在保护“谁的安全”的争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的安全保障,到底应由谁来负责、通过何种方式分责、以何种安排共担风险和损失,这些问题也亟待筹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种新型安全观的支撑,虽然中国政府已提出和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但在详尽阐释其内涵、构建和充实相应安全机制安排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由此,“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不是以安全为导向的战略,但却面临不少导致其被“安全化”的难题。需要看到的是,这些难题都不是简单的安全挑战,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发展—安全相互联结”(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问题。发展通常是解决不安全根源的一种手段,但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诱发和深化各类安全问题的因素;而安全方面的状况和相关保障举措如何,也将对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状况很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出现,我们需要更好筹谋如何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被“安全化”并不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但也间接反映出妥善处理安全问题对于落实这一国际合作倡议的重要性。应当说,“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扩展深化,也对我国如何维护海外资产安全、与相关行为体构建新型安全关系等提出考验。“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工作,其核心挑战在于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处理好我国对外关系中越发突出的“发展—安全相互联结”问题。相较于以往我国参与或推动的国际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安全保障难度和复杂性会更加突出。

当前,与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前期准备、机制构建

和资源投入相比,“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较为显著的“安全赤字”,并体现为以下三大矛盾。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比如,考虑到阿富汗等中亚、南亚国家安全局势堪忧,不排除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以及跨国犯罪集团搭“互联互通”的顺风车,对我国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输入性风险”。二是“一带一路”作为整体性规划与分散性、多样性、碎片化的安全风险之间的矛盾。“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实现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大体系”,但各类安全风险也可能借此相互转化、交叠强化、外溢泛化,通过“一带一路”所构建的联通体系进行“散播”。三是“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需求的增大与我国相关经验、机制和资源不足的矛盾。除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亚丁湾地区护航等之外,中国目前以军事力量、准军事力量介入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经验较为有限。在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保障方面,很多工作仅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先例可循。^[9]

为应对上述“安全赤字”,首要任务是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尤其是针对重点国家、重点方向和重点项目涉及的安全风险进行科学、细致、深入的评估。所谓“安全风险”,就是指对个人、项目、资产等安全相关的风险因素的集合。与一般性的投资风险或经贸合作风险分析不同,“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风险具有涉及面广、动态性强、交织联动的特征。因此,不能仅满足于罗列各类安全风险,还应努力厘清安全风险发生作用的机理,识别安全风险所涉及的“利益攸关方”,预测各类安全风险转化散播的情景。需要在既有安全风险认知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一带一路”建设实际需求、适合中国海外安全保障工作实际情况的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囿于篇幅,本文简要分析“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存在的若干共性安全风险。

第一,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战乱、武装冲突等因素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构成威胁。沿线中小国家很多都面临来自俄罗斯、印度、美国等大国的压力,“多面下注”情况比较普遍,这会对“一带一路”重要项目的合作和对接产生负面影响。沿线国家中,有20多个国家有美国驻军或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美国16个“非北约盟国”中有10个以上处于该区域。^[10]美国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去美国化”的经济和政治安排。^[11]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西拓展,将有不少项目牵涉北约成员

国,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13个位于该区域。此外,美国也担心“一带一路”冲击美国提出或推动的地区合作进程,如“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湄公河下游倡议”等。“一带一路”建设或将触动美国的敏感神经,相较于其他地区性大国,美国的反制将具有全局性特征,它不仅在“海上亚洲”对中国进行压制,也会在“陆上亚洲”尤其是临近中国的中南半岛地区加大掣肘力度。^[12]

印度担心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也不愿其所推动的“中亚—南亚走廊”等倡议受到“一带一路”的冲击。据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风波即与来自印度方面的阻力有关。^[13]孟加拉、马尔代夫等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也受到印度的很大影响。欧盟则担心“一带一路”对其“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中亚伙伴关系战略”带来不利影响。此外,有些地缘处境复杂的中小国家也会对“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安全风险。俄美欧三方力量的博弈致使乌克兰危机不断深化,形成欧亚核心区的典型地缘政治风险。阿富汗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进而危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南翼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北线。中亚国家之间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源争夺,外高加索国家之间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领土争端等,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应高度重视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

第二,国家内部或跨国性的政治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不少都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敏感转型期,政治生态复杂,经济成熟度不高,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政治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反对派借中国问题攻击现政权,强化本国社会民意针对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等情绪。二是国内权力交接导致政局波动。中亚国家的“老人政治”问题较突出,南亚部分国家军人干政现象也多有发生。政局变化不一定完全不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但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干扰。三是国内不同族群和教派之间的冲突导致“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不力,有些冲突还具有跨国性影响。四是有关国家政府内部各部门协调不力,行政效率低下,难以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必要安全保障。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缺乏有效管控,有些腐败的政府官员甚至与不法分子合谋利用安全问题牟利。^[14]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

经济发展形势的恶性变化也会诱发和加剧相应政治风险。近年西亚北非地区的政局动荡,其直接因素就是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上的外部脆弱性比较明显,长期处于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出口结构单一,外汇储备薄弱,负债率较高。未来一个时期,在能源资源出口下降、粮食价格上涨、国内资本加快外流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国家或将出现货币大幅贬值、急剧的通货膨胀以及持续的经济低迷,进而造成社会动荡,深化政治风险,给“一带一路”的相关合作带来重大安全压力。

第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非传统安全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其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具有跨国性、易突发、外溢性强等特点,防范和治理难度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且暴力恐怖活动近年呈现分散化、本土化、独狼化、网络化特征。此外,“海上恐怖主义”活动日趋增多,它们通常以船舶、钻井平台、港口城市、旅游景点等作为袭击目标,造成海洋运输路线中断、海洋污染等严重后果。^[15]

二是海盗、贩毒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日趋猖獗,它们往往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形成复杂的“共生体系”,甚至和政府官员、军队相互勾结。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等都是海盗频发地区。“亚洲反海盗及武装抢劫区域合作协定组织”(ReCAAP)2015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亚洲海域2014年共发生183起海盗袭击和抢劫案件,较2013年增加22%,创10年来新高,亚洲海域案件已占全球案件总数的75%。^[16]“金三角”(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地带)和“金新月”(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交界地带)地区的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也长期难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或与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勾连,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人员实施绑架勒索等。

三是海啸、地震和风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生态安全问题较为突出。《世界灾害报告2014》称,2013年全球约有1亿人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其中超过半数生活在亚洲地区。根据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发布的全球巨灾数据,2014年一半以上的自然巨灾发生在亚洲,印度、日本、巴基斯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损失最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因经济实力有限,在自然灾害预测与管理、备灾机制、救援和灾后重建方面资源投入显著不足,同时也缺乏灾害

应对的区域性机制和安排。“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应重视经济发展的“增量”投入,还应关注“损失”控制,尤其是自然灾害对涉及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和人员的安全威胁。

三、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工作的基本思路

应当看到,“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各类复杂的安全风险,安全保障工作涉及面广、不可预测性强,应对难度大。然而,风险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风险是可以被管理的,需将安全风险的防范与应对贯穿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全过程。尤其是在这一倡议落地的起步阶段,须对安全风险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对安全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化解,从机制、资源、人力等多方面强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力争实现“防范为主、风险共担、重心下移、行动有力”。

第一,对重大安全问题进行系统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安全风险评估体制。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必须深入做好安全风险的评估工作。这类评估应首先聚焦于重点国家、重点方向和重点项目,加紧探索安全保障工作的支撑体系建设。要以保障重点项目顺利落地为目标,做好国别和地区安全形势调研,拓宽收集安全风险信息的渠道,识别影响安全风险的“利益攸关方”,细化风险情景分析,使风险评估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应尽量使重大项目避开风险聚集或高风险地带,做好“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各阶段的风险应对预案。此外,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需注重从区域一体性和不同安全风险转化、联动的角度进行评估。

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的评估和预案制定,需大力发挥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积极性,以及外交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性。驻外使领馆负责政治、安全和商业事务的人员可进一步完善定期联合研判机制,尤其是商务处在帮助企业应对安全风险方面可成为更为有力的纽带。可考虑由使馆推动建立“安全事务谘商会议”和“荣誉领事”等制度,邀请在当地有经验、有资源的人士协助处理安保问题。驻外使领馆可在符合工作规定的情况下,与他国相关使馆进行安全信息和风险评估方面的机制性交流。还可联合他国外交人员、企业共同组织“危机推演”,提前就危急时刻如何使用当地有限的安全资源进行预先协调,从而降低撤离、救援时可能产生的冲突,使安全保障更具协同性和效率。^[17]

第二,实现风险的分散是管理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培育各主体的“风险共担”意

识,并完善相应机制体制。应真正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力争实现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在尊重他国维护经济发展自主性以及他国主权的情况下,对接越深越安全,特别是有助于降低他国政局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谈判过程中,需关注安全风险防控问题,尽可能地明确安全保障方面的权责划分,推动东道国政府对相关项目的安全保障切实承担责任。可结合项目落地的实际需求,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安全和执法合作,完善多边性安全保障合作安排,订立有约束性的协议,避免出现国际法层面的矛盾,使多主体参与的安全保障工作更加协调有序。

此外,需注重从“地区安全治理”的视角推进风险共担,通过提升功能性议题(如水资源、能源安全)的治理水准,降低和防范相应的安全风险。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分散,可考虑建立区域性的安全风险保障基金。基金可主要用于强化相关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为企业提供必要救济等,通过这类平台使“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共享、风险共担与团结互助更有保障。可借鉴欧盟建立灾害防范共同框架、设立 E-Risk 系统等经验,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联合相关国际组织推动实现“区域灾害风险管理一体化”,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洪水、海啸、地震、核危机等风险的监测分析,更好地协调各方的风险响应政策和行动。^[18]

第三,强化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使安全保障的责任“重心下移”。“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要靠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来落实。近年,在多次海外紧急撤离行动中,中国政府并未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对相关企业和公民收取费用,但未来如何进一步明确救济原则和范围、有效分担安全保障成本,并借此增强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意识,应进行研究。中国企业需尽快补足跨国经营中安全保障“短板”,借鉴国外跨国公司经验,设立负责安全保障的主管职位,充实企业内部相关机制和资源投入,建立跨国安保、风险管理方面的“标准操作规程”。企业不仅应深入评估安全风险,还要善于和影响安全风险的各类行为体打交道,包括增强与本地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的沟通能力。企业在当地应重视建立“信息获取网络”和“政策影响力网络”,挖掘有助于提升自身安全保障的本地资源,有意识地锻造抗风险能力和安全危机后的再生能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应鼓励中国企业与美欧等国企业开展联合投资项目,从而促使各方共担安全风险。探索设立针对政治和安全风险的投资保险机

制,分担企业“走出去”的非商业成本。可借鉴美国国务院的海外安全咨询委员会、英国海外企业安全信息服务机构、日本海外安全公私合作理事会等机制,大力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19]政府可支持中外企业、行业之间进行围绕安全保障问题的对话与协作。可考虑由省一级外事部门建立“企业外事人员安全培训中心”,对外派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障资质进行认证。制定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指南,提升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冲突预防和化解能力。借鉴美国“志愿国际行动理事会”、“班克罗夫特环球发展组织”等机构经验,鼓励企业积极支持中国民间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活动,在民间组织和企业之间建立“小旋转门”制度,培养和储备相关人才,培育具有海外行动能力的中国民事安保力量。^[20]

第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形成反应迅速、多方联动的安全风险应对机制。构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能力,有赖于中央、地方、企业和驻外机构的四位一体,有赖于外交、发展和防务政策的紧密结合,有赖于中国与东道国的沟通协调,有赖于中国与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高效协作。可借鉴美国等其他大国的经验,在外交和发展援助机构中嵌入冲突预防、安全援助等功能,建设在危急时刻可迅速展开行动的“专家池”和“突击队”,发挥其前瞻预警、快速反应和在地协调的功能。^[21]需要与相关大国和重要地区性组织加强在安全事务方面的接触,可在救灾、海上搜救等低敏感性领域扩展合作,做好海陆联合救援等新型合作模式的预研。比如,2016年德国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可考虑与该组织深化沟通。^[22]还可增进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等机制的接触,探索在中亚、西亚等地的伊斯兰国家完善安全保障的有效方式。

结语

“一带一路”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即整合沿线国家发展动力、强化各方自主发展韧性,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我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经营对外发展空间的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应发挥巨大的“带动性作用”,带动解决一系列困扰中国外交、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长期性难题,包括提升对中国海外资产、人员和利益的安全保障能力。^[23]近年,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不断扩展,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越发突出,特别是海外领事保护案件呈现从偶发、单向频发、群发演化的态势。^[24]

“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以安全为导向,但面临被“安全化”的突出难题,客观上也存在诸多安全风险挑战。这为我国加快海外安全立法建设、完善海外安全保障机制、深化国际安全与执法合作等提供了有力契机,将使相关工作的推进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前瞻性。探索如何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工作,尤其是如何有效应对“发展—安全相互联结”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这一工作需要早作筹谋、提前着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平衡运用外交、发展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政策手段,加快培养兼具研究、倡议和行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寻求切实管用的创新性思路和做法。

[注释]

- [1]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J],《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 [2] [7] Erica Marat, “Following the New Silk Road”, *The Diplomat*, October 22, 2014.
- [3] [德]亚历山大·利布曼:《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J],《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50—52页。
- [4] Alexander Gabuev, “Eurasian Silk Road Union: Towards a Russia-China Consensus?” *The Diplomat*, June 5, 2015.
- [5] Zorawar Singh, “Ind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dea”, *Journal of Defense Studies*, Vol.8, No.4, 2014.
- [6]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J],《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 [8] Max Boot, “More Small Wars: Counterinsurgency is Here to Stay”,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4.
- [9] 夏莉萍:《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风险与保护》[J],《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第14—16页。
- [10] 截至2015年12月,美国的“非北约盟国”包括澳大利亚、埃及、以色列、日本、韩国、约旦、新西兰、阿根廷、巴林、菲律宾、泰国、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阿富汗、突尼斯。
- [11] Yukon Huang, “Courting Asia: China’s Maritime Silk Route vs America’s Pivot”, *The Diplomat*, April 25, 2014.
- [12] 赵明昊:《试析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走向》[J],《国际论坛》2014年第3期。
- [13] 斯里兰卡前国防部长哥达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在2015年7月公开演讲中透露这一信息,“India asked Lanka to stop Colombo Port City Project, says Gotabaya”, <http://www.eyesrilanka.com/2015/07/18/india-asked-lanka-to-stop-colombo-port-city-project-says-gotabaya/>,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6日。
- [14] Stephen Biddle, “Afghanistan’s Legacy: Emerging Lessons of an Ongoing War”,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7, No.2, Summer 2014.
- [15] Carolin Liss, “New Actors and the State: Addressing Maritime Security Threats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5, No.2, August 2013.
- [16] 《去年亚洲海盗袭击抢劫案件激增》,2015年1月15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1/5413896.html>, 访问日期:2015年9月22日。
- [17] 杜懋之、赵晨:《海外公民保护与欧中安全合作》[J],《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
- [18] 游志斌:《欧盟推动区域风险管理一体化的战略》[N],《学习时报》2013年10月14日。
- [19] 以美国海外安全咨询委员会为例,目前有3500多家美国私营企业、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为该委员会成员,根据经营领域、专业特长等因素,部分成员单位派员任“风险与信息分享”、“促进创新和行动优化”等分委员会的主席, <https://www.osac.gov/Pages/AboutUs.aspx>, 访问日期:2015年12月24日。
- [20] 徐彤武:《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J],《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
- [21] J. Brian Atwood, M. Peter McPherson & Andrew Natsios, “Arrested Development: Making Foreign Aid a More Effective Too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8.
- [22] 笔者与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学者的交流,2015年6月。
- [23] 赵明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含义》[J],《新战略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编)2015年第4期,九州出版社,第22—32页。
- [24]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曾在2014年7月表示,“重大领保案件全球多点同时爆发常态化”。另参见《2014年中国境外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总体情况》,人民网,2015年7月1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01/c1002-27237232.html>, 访问日期:2015年10月16日。

作者简介:赵明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100860)

收稿日期:2015-12-26

修改日期:2016-01-25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The Security Issues Concern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by Zhao Minghao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is not security-oriented, though it confronts a number of security challenges. Generally speaking, development is a solution to security issues, bu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t may bring about or deepen them. As the “New Silk Road” plan initiated by the US sugges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s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s. Given China’s underdeveloped overseas security capaci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ay encounter “security deficits”, and it has to learn to tackle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ecurity related problems. To make the Initiative a success, it needs not only to explore innova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but also to deal with security challenges with more tailored, creative and effective approaches.

7 Northern Sea Rou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State’s Jurisdiction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by Zheng Lei

Russia views the Northern Sea Route as its internal water, and demands that foreign ships must be permitt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before sailing on this sea route. The reasons why Russia takes those measures include, Russia wants to uphold its historical rights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and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hrough taking those measures. Russia also want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rctic seas. In response to the Russian management measures, China need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respect for the legitimate security interests of Russia as a coastal state, deal properly with Russia’s claims over the Northern Sea Route, maintain China’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Northern Sea Route.

13 South Korea’s Arctic Strategy: Logic of Construction and Vision of Implementation by Xiao Yang

The Arctic Policy Execution Plan whic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2015, marked South Korea had changed the Arctic strategy into more spe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This paper based on South Korea’s history of engagement in Arctic affairs,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 arctic shipping, shipbuilding and energy exploring, on its posi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As South Korea’s interest in the Arctic has gone beyond the border of business and scientific affairs, the pursuit of great-power status will become a new window to study and estimate the driving power for South Korea’s engagement. Most of the Arctic countries welcome South Kore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governance, South Korea’s influence in the Arctic region will increase, which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 South Korea is on the way to becoming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ore of South Korea’s Arctic strategy, discuss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which a successful strategy may need and interprets its way of developing the strateg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Arct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 A Brief Analysis on EU Development Aid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Ghana

by Liu Qingjian & Zhao Yating

After Rawlings came to power in the 1980s, Ghana began the gradual political democratic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EU began to adjust development aid policy, which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ised as tak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od governance as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aid policy. Bo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Ghana needed EU’s financial support. For over 30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Ghana takes flexible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insisting on independence and responds actively to EU’s development aid demands which take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od governance as political orientation, receiving a steady